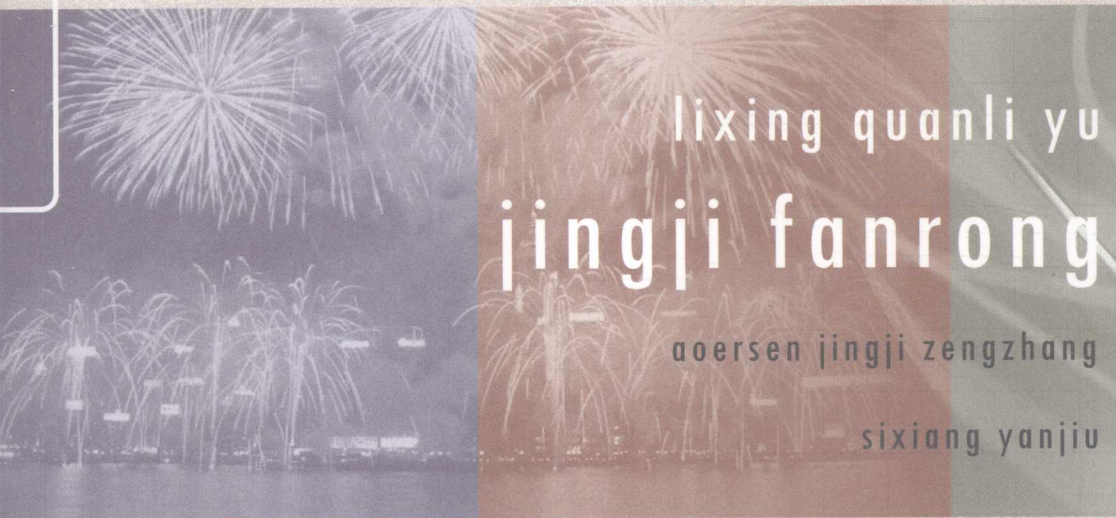


中国经济哲学博士文库 张雄 鲁品越 主编



# 理性、权力与经济繁荣

奥尔森经济增长思想研究

姚震宇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经济哲学博士文库 张雄 鲁品越 主编

本书由南通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 理性、权力与经济繁荣

奥尔森经济增长思想研究

姚震宇 著

lixing quanl

jingji f

oerlun jingji zengzhang

sixiang yanjiu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理性、权力与经济繁荣:奥尔森经济增长思想研究/  
姚震宇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中国经济哲学博士文库)  
ISBN 978—7—208—07855—0

I. 理... II. 姚... III. 奥尔森—经济增长—经济思想—  
研究  
IV. F06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57221 号

责任编辑 齐书深 苏莉莉  
封面设计 储平

· 中国经济哲学博士文库 ·

**理性、权力与经济繁荣**

——奥尔森经济增长思想研究

姚震宇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5.75 插页 2 字数 221,000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7855—0/F·1750

定价 25.00 元

## 序 言

承载着学界的期望,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经济哲学博士文库》面世了。此次推出了它的第一批作品,这是全国有志于经济哲学研究的博士们的共同园地,我们热切地期望:它在不久的将来,将推出更多更优秀的经济哲学专著。

今天的中国,正处在创造历史奇迹的年代。伴随着经济的迅速起飞,市场经济每天都在演绎新的故事,经济全球化浪潮冲击下的社会生活方式日新月异。这一切构成了我们时代的历史画卷。这是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也是高度复杂的时代。在这样伟大而复杂的社会面前,一切以人为划分的边界作为自己专业领域的社会科学学科——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显得苍白无力:无论哪种社会现象,已经超越了某个专门学科领域,必须综合各门学科研究才能搞清其来龙去脉。而哲学,作为人类对整个世界的最深层秘密进行思考的思想结晶,能够以其理性的光芒,引导各门学科突破自己专业领域的局限,打开通向客观事物本身的精神之路。

因此,分析当代经济现实,已经离不开哲学。当代经济现实本身的复杂性,人类对当代经济学理论的价值期待,召唤着学者们要用哲学的眼光来审视经济学理论的内在本质,来开拓经济学理论面向现实的道路。这正是当代经济哲学的使命。

经济哲学研究不仅是当代社会的需要,也有着悠久的学术传统。所谓哲学,是人类对世界和人生的终极本质、价值理性的追问与探索。这种探索成为科学探索未知世界的向导。当它构成某一领域后,一门新的科学便诞生了,因此哲学成为当代一切科学之母,当代一切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都是从哲学的母腹中诞生出来的,经济学也是如此。近代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并非经济学家,而是撰写了《道德情操论》的哲学教授。正是在对人类经济行为的哲学追问中——什么样的经济行为是善,政府应当如何对待人们的经济行为,亚当·斯密提出了

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提出了自由放任的政策主张，创立了政治经济学。而在经济学建立之后，哲学继续向新的未知领域追问，引导着科学继续进行探索，不断提出新的问题，提出解答问题的思路与方法。而哲学对世界的终极关怀，也是科学研究的动力之源。

经济学与哲学结合的学术传统，在马克思主义中得到了最充分的继承与发展。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唯物史观，指出人类的经济生活世界乃是人类全部社会生活的决定性因素。人们的精神生活世界，包括政治的、法律的、宗教的生活，不过是经济生活世界的反映，是物质生活在精神领域中的投影。在人类经济生活世界中，蕴藏着解开人类社会发​​展奥秘的密码。而马克思的第二个伟大发现——剩余价值，则将经济学理论建立在哲学基础上：因为劳动实践是人类的生存方式，“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资本论》既是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经济学著作，同时也是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历史哲学著作，是经济哲学的经典之作。马克思的这一伟大传统正在被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所继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仅具有丰富的哲学内涵，同时也有极其丰富的经济学内涵，是当代经济哲学的伟大成果。

当然，经济哲学永远不可能替代作为科学的经济学，而只能作为经济学的服务者与引导者。它所提出的问题，只是从哲学的深度上提出的问题，还有待于经济学将其具体化；它所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思路，毕竟只是从哲学角度提出的抽象的、缺乏具体操作性的哲理思路，还有待于经济学进行选择，将其具体化为具体的科学方案。并且，一旦经济哲学的某种见解能够被经济学所接纳，并且加以具体化与精确化，形成具体的经济学理论之后，经济哲学便应转向更深层次的探索，以便为经济学的下一步发展开拓前进的道路。

因此，经济哲学的研究者将永远是拓荒者。有志于经济哲学的博士及其论著是这块荒野中初生的嫩芽。我们期待着更多的富有生命力的嫩芽出土，更希望它们能够长成给人类带来一片绿阴的大树。

是为序。

张 雄 鲁品越

2008年6月于上海江湾五角场

# 目 录

导 论 / 1

第一章 奥尔森经济增长思想的基本内容 / 18

第一节 奥尔森经济增长思想的基本内容概述 / 18

第二节 奥尔森关于经济增长的两个基本观点 / 20

第三节 集体行动理论与两个观点的关系 / 34

第四节 集体行动与两个领域的繁荣 / 42

第二章 奥尔森经济增长思想与经济增长理论流派 / 46

第一节 经济增长理论的演进 / 47

第二节 奥尔森经济增长思想与古典及新古典增长理论 / 61

第三节 奥尔森经济增长思想与内生增长理论 / 64

第三章 奥尔森的方法论探微 / 79

第一节 奥尔森的研究路径与方法 / 79

第二节 奥尔森对建模与社会科学研究看法 / 88

第三节 奥尔森方法论的评价 / 94

第四章 具有“双刃”的个体经济理性 / 105

第一节 作为奥尔森理论基础的“个体经济理性” / 105

第二节 奥尔森关于个体经济理性与经济繁荣关系的阐述 / 109

第三节 个体经济理性的误读、流变与反思 / 120

第四节 严格的个体经济理性的有害性与非理性的意义 / 127

<b>第五章</b>	<b>推动繁荣的权力——奥尔森政府论 / 133</b>
第一节	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到新政治经济学 / 133
第二节	经济学中的政府论的主要内容 / 137
第三节	奥尔森的进化论政府论 / 142
第四节	强化市场型政府的解析与建构 / 156
第五节	评析:空泛的权力理论与过于理想化的权力 / 165
<b>第六章</b>	<b>不公正的利益集团民主政治与政府的利益立场 / 170</b>
第一节	利益集团及利益集团理论 / 171
第二节	利益集团与民主政治 / 175
第三节	奥尔森利益集团理论的深刻影响 / 184
第四节	利益集团政治的对策 / 188
<b>第七章</b>	<b>奥尔森经济增长思想的启示与中国当代的经济增长 / 194</b>
第一节	奥尔森经济增长思想的实质及启示 / 194
第二节	政府竞争引致的投资推动型增长及其产生的问题 / 202
第三节	源自个体经济理性的问题的出现 / 213
第四节	经济增长的动力转换与权力重构 / 226
	<b>中文参考文献 / 234</b>
	<b>外文参考文献 / 239</b>
	<b>后 记 / 242</b>

## 一、个体经济理性、权力与经济增长：一个框架

个体经济理性是指作为经济学基础假设的经济人的自利最大化。个体经济理性与社会经济繁荣的关系最经典的解释体现在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理论中。“看不见的手”机制有两种解释：第一，在市场的联结下，每个人只需要考虑自己的利益、为满足市场需要而生产便会产生一个自然的自由体制或哈耶克所说的“自发的扩展秩序”；第二，受市场机制这一“看不见的手”的指引，每个人的自利最大化最终会产生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的福利后果，即“福利经济学第一定律”。通常，这两种解释是联系在一起的，自发秩序的形成与社会个体的福利均衡的形成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古典经济学对于个体经济理性与社会经济繁荣的内在一致的基本认识体现了西方经济学中市场自由主义秩序观和价值观，这种世界观和价值观在当代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如哈耶克、弗里德曼的思想中得到了放大。对于自发秩序以及个体理性与社会福利一致性的信念引导了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两种求证：一是秩序求证，二是福利求证；前者是对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求证，后者是对帕累托最优的福利最大化的求证。几乎与此同时，作为经济学的基础假设的“经济人”被抽象成掌握完全信息和具有无限计算能力的“数学晶体”<sup>①</sup>，个体经济理性也被定义成精确的消费者个体的效用最大化和厂商的利润最大化。

但是，伴随着对“经济人”的反思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无论这种秩序观还是这种福利观都遭遇了挑战。一方面，制度学者指出，新古典经济学所假定的完全理性的“经济人”是不现实的，经济学家西蒙从管理决策和心理学的角度提出“有限理性”的假设；另一方面，公共选择学

---

<sup>①</sup> 参见张雄：《理性的崇拜与缺憾：传统经济学理论方法的审视》，《哲学研究》1996年第5期。



者从公共品供给中的“搭便车”现象和合作难题出发,揭示了个体经济理性对社会整体福利的危害性,一批学者还通过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揭示了狭隘的个体经济理性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所产生的负福利后果,包括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德国学者乌韦·让·豪斯甚至认为,如果每个人每时每刻都遵循精明的自利最大化理性原则,市场经济则无法运转。总之,在当代经济学发展过程中,新古典经济学中经济人的完全理性得到了一定的修正,个体经济理性与经济繁荣的关系得到了重新审视,在新制度经济学的话语中,人们认识到了个体经济理性与经济繁荣两者关系的复杂性。

经济学中的权力是指主体对经济资源的控制力和对他人经济活动的约束力、强制力。在现代社会,权力是通过法律产生、采取合法化的形式而存在的,源于个体“天然”影响力的非正式权力发挥着有限的作用,集中了各种强制力的现代政府是权力的代名词。权力与经济繁荣的关系在自由主义传统的经济学中较长时间没有能够得到全面而正确的理解,人们较多地强调权力与强制是自由市场的对立物,尤其是新古典经济学确立数学化的走向之后,权力和制度因素被看作是无需讨论的外生因素。随着包括产权经济学和新政治经济学的制度经济学的兴起,权力对于经济绩效的重要性才被普遍地认识。产权经济学强调了私人财产权的保证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重要前提,科斯的产权理论表明不同的产权安排会产生不同的资源配置后果,因而产生不同的经济绩效(斯蒂格勒总结的科斯第二定律)。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C. 诺斯强调了国家作为产权界定和保护组织的有效性,进而强调不同性质权力产生的不同制度安排对不同经济绩效的影响。作为公共选择理论奠基人和新政治经济学家的布坎南和塔洛克通过对现代民主政治权力代理结构中权力掌握者的经济人分析,强调不同的权力性质与结构产生不同的社会福利后果。总之,现代经济学的进展使得权力进入了经济学讨论领域。

需要指出的是,一些学者认为现代经济学尤其是新政治经济学的这种进步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种回归。著名经济学家罗宾斯曾指出,亚当·斯密“一方面大力倡导‘自然的自由秩序’,另

一方面又历数了统治者必须具备的权力,其中除了军备和制定实施内部法规之外,还包括提供公共工程和公共设施”<sup>①</sup>。他强调,“一个经常被众多的经济思想史专家们忽略的事实,就是这些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的整个观点与更早期的学者们的想法相反,积极地肯定由国家来承担某些先前由私人组织承担的功能,施行税收,控制税卡,货币铸造,以及废除私人雇佣军等等。而且研究还详细地表明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本身就是敦促国家在提供重要的福利服务、教育、对特定类型的贫困进行救济等方面采取行动的前驱”<sup>②</sup>。他甚至认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放任主义的终结》中强调的那些政府干预的原则和亚当·斯密的提法别无二致,并认为“凯恩斯与其前辈们之间的共同点要比他所愿意承认的要多得多”<sup>③</sup>。

古典经济学家休谟从他的“人性论”出发着重强调了市场经济的财产权基础,从而间接地强调了政府权力对财产权的保护对于市场经济的重要性。休谟在《人性论》中指出:“我们拥有的物品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种类:一类使我们的心灵感到内在的满足,一类使我们的身躯感到外在的利益,还有一类是借助于我们的勤劳及财富而获得的欢乐。第一类的享受,我们完全可以无忧无虑。第二类可以从我们手中夺去,但对夺得者并无好处。只有第三类既不会幸免于别人的暴力争夺,又不会因为易手而降低它对人的价值;而与此同时,这一类物品的数量又不足以满足每个人的欲望和需要。所以改进这类物品是社会的首要利益所在,而拥有这类物品的不稳定性以及它们的匮乏则是主要的障碍。”<sup>④</sup>休谟由此强调对易于受到侵害和掠夺的财产保护的重要性。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产权学派强调政府权力对财产权保护某种意义上只是对休谟观点的重申。

---

①② L. 罗宾斯:《过去和现在的政治经济学——对经济政策中主要理论的考察》,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1—12页。

③ L. 罗宾斯:《过去和现在的政治经济学——对经济政策中主要理论的考察》,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4页。

④ 转引自L. 罗宾斯:《过去和现在的政治经济学——对经济政策中主要理论的考察》,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3页。

可见,政府权力并非古典政治经济学所忽略的因素,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政府权力对于社会经济繁荣的重要性,不同的权力结构和政府政策显然会产生不同的社会经济后果。正因为如此,新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詹姆斯·布坎南曾明确指出自己的“立宪经济学”是对亚当·斯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某种精神上的回归。<sup>①</sup>

在一些旨在实现向古典政治经济学回归的当代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讨论社会如何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和繁荣问题,实际上存在着由个体经济理性、政府权力和经济增长三个范畴复杂关系构成的框架。这一框架包括三层关系:个体经济理性与经济繁荣的关系,政府权力对个体经济理性的制约关系,政府权力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这三层关系跨越了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领域,反映了当代经济学与其他学科融合的趋势。当代新政治经济学者对三者关系的基本共识大体在于,政府权力结构产生的制度结构,规定和制约了社会个体的经济理性行为,也主宰了人们从市场体系的互动中得到的福利结果,政府权力与社会个体经济理性的关系设定对社会的经济繁荣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而经济理性引导下不同政府权力及其结构会产生不同的经济绩效。这一个体经济理性、权力与经济增长的三角形关系框架较为完整地体现在新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曼瑟·奥尔森(Mancur Olson)<sup>②</sup>的学术思想中。

## 二、奥尔森的三部重要著作与三个核心范畴

曼瑟·奥尔森(Mancur Olson, 1932—1998),马里兰大学经济系教授,1954年获得北达科他州立大学学士学位,1960年获牛津大学硕士学位,1963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63—1967年任教普林斯顿大

---

<sup>①</sup> 布坎南指出,亚当·斯密早期思想的重心是致力于不同的制度结构的比较,而他本人的立宪经济学强调立宪的重要性,是将新古典经济学忽略掉的政府和权力因素重新纳入经济学的领域。见 James M. Buchanan, *Constitutional Economics, Exploitations Intoconstitutional Economics*, Texas A & M University Press, 1989.

<sup>②</sup> 《集体行动的逻辑》、《国家兴衰探源》和《权力与繁荣》的中译本及其他相关文献中,对 Mancur Olson 的翻译并不一致,有曼瑟尔·奥尔森、曼库尔·奥尔森、曼瑟·奥尔森和曼柯·奥尔森等不同的译法,本书正文统一译成曼瑟·奥尔森,所引出处时仍保持原样。

学,职位是经济学助理教授;1967—1969年任职美国联邦政府卫生教育和福利部(时值约翰逊当政);1969—1998年任教马里兰大学经济系,其间1969—1970年任副教授、1970—1979年任教授、1979—1998年任功勋教授。1990年由美国国际开发署提供资助,奥尔森在马里兰大学建立制度改革和非正式部门研究中心即“IRIS”(Center on Institutional Reform and the Informal Sector),任中心主任和首席研究员。

奥尔森一生学术成果颇丰,发表的专业论文近50篇、非专业文章近100篇、著作7部,即《战时短缺经济学》(1963)、《集体行动的逻辑》(1965)、《一份准备中的报告》(1969)、《没有增长的社会》(1974)、《健康护理经济学新方法》(1982)、《国家兴衰探源》(1982)、《权力与繁荣》(1998)。主要论文有:《通向经济成功的一条暗道》(1992,《市场经济在东欧的兴起》)、《专制、民主与发展》(1993,《美国政治学评论》)、《关于政府经济的著名演讲:大额钞票丢在路边——为什么有些国家富裕有些国家贫穷?》(1996,《经济学展望杂志》)等。

代表其学术成就的是三部重要著作:《集体行动的逻辑》、《国家兴衰探源》和《权力与繁荣》。

1965年,时任普林斯顿大学助理教授的奥尔森推出了《集体行动的逻辑》(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在这一著作中,奥尔森立足于理性经济人的经济学基础假设,认为由于集体行动的目标是非排他性的集体物品,所以人数众多、成员均质的大集团存在集体行动的困难。这一结论挑战了一个人们习以为常的“公理”即具有共同利益的人们会自发地采取集体行动,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重视,从而奠定了奥尔森的学术地位。第一,他的“集体行动理论”为公共选择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分析视角,他因此被公推为公共选择学会的会长(1972—1974);而由于公共选择理论在当代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地位,他被选为南部经济学会会长(1981—1982)和美国经济学协会副会长(1986)。集体行动理论使其赢得了在美国经济学理论界的声誉与地位。第二,他的集体行动理论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学术领域,他被认为是“集体行动理论”的奠基人。在1965年《集体行动的逻辑》出版后,

政治学家罗素·哈丁(Russell Hardin)发表《集体行动》，经济学家托德·桑德勒(Todd Sandler)发表《集体行动：理论与含义》，分别在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基础上继续了集体行动问题的讨论。“集体行动”已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课题。第三，他将理性经济人的集体行动分析范式引入了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等领域，因而推动形成了“经济学帝国主义”，对经济学之外的其他学科产生了广泛影响。1993年《集体行动的逻辑》获得美国管理学会颁发的“最持久贡献著作奖”，1995年又获得美国政治学会颁发的“里昂爱泼斯坦奖”。第四，《集体行动的逻辑》先后被翻译成十二种语言，奥尔森的学术影响因此在空间意义上跨越了本土，集体行动理论的基本原理被世界范围的学者大量引用。总之，集体行动理论使奥尔森成为具有跨学科影响和世界范围影响的大师级人物。

1982年，时任马里兰大学教授的奥尔森推出他的又一部力作《国家兴衰探源：经济增长、滞胀与僵化》，在该书序言中奥尔森指出它是《集体行动的逻辑》的姐妹篇、是集体行动理论的运用。《国家兴衰探源》也被翻译成十多种文字，而且此书在出版发行后的第二年(1983年)获得美国政治学会颁发的克莱姆惹奖。

《权力与繁荣》是奥尔森的遗著，其关注的核心问题是“长期的经济增长与繁荣需要什么样的政府”，是对这一问题的系统回答。这部著作是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发表的一系列文章的总结。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奥尔森陆续发表了一些论文，例如《规模与发展的不经济》(Diseconomies of Scale and Development, Essays in Honor of Peter Bauer)、《关于政府经济的著名演讲：大额钞票丢在路边——为什么有些国家富裕有些国家贫穷?》(Distinguished Lecture on Economics in Government-Big Bills Left on the Sidewalk: Why some Nations Are Rich, and Others Poor?)等。这些文章旨在表述这样的观点：如果一个国家内，巧取豪夺容易，投资、分工、合作与生产就会萎缩，因而政府权力与经济繁荣密切相关。90年代，在马里兰大学“制度改革与非正规部门研究中心”(IRIS)，奥尔森结合自己的理论致力于研究东欧和第三世界国家如何实现经济转型和政府改革，形成了一系列论文成果。

以这些文章为基础,奥尔森以政治学的权力和经济学的繁荣为基本范畴形成了一个政府行为与经济繁荣的关系的系统观点,即《权力与繁荣》一书内容。

结合其他学者的看法,本书认为奥尔森最重要的三部著作具有体系化的特征。其中“集体行动”是基础分析工具,如何实现社会经济繁荣或经济增长具有中心和主线地位,个体经济理性、政府权力与经济增长是其学术思想中的三个核心范畴,这三个范畴的关系是其学术思想的基本框架。

综合奥尔森的三部著作,曾接受奥尔森教授指导的张宇燕认为“奥尔森提出三个看似平常、实质重大的问题:为什么对每一个人都有利的集体行动常常难以实现?国家兴衰的根本何在?同样是市场经济国家,为何有些经济繁荣而另外一些却遭受穷困?《集体行动的逻辑》(1965)一书可以说是他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并在回答中奥尔森开创了与其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s ‘集体行动经济学’。群体规模、搭便车、选择性刺激等范畴业已广泛地运用于经济分析之中。《国家兴衰探源》(1982)则是他运用集体行动理论来解释国家之繁荣与萧条历史现象的一次成功尝试,同时他还进一步丰富了一些极有价值之概念或命题的内容,比如相容利益(encompassing interests)、分利集团以及个人理性并非集体理性的充分条件等。《权利与繁荣》(2000)通过引入政府权力于经济增长分析之中,说明了国家权力与私人权利之间(政府与市场)的相互关系决定了繁荣程度。”<sup>①</sup>张宇燕认为,奥尔森的思想核心是“强化市场型政府乃经济发展之根本”。

奥尔森的同事卡德威尔(Charls Cadwell)也认为,“他(奥尔森)早期的也是被人引证最多的作品《集体行动的逻辑》,解释了为什么集团常常不能为自己的集体利益而行动,以及他们如何才能成功地行动”。“几乎在《集体行动的逻辑》出版后的20年,奥尔森在《国家的兴衰:经济增长、停滞和社会僵化》一书中将他的看法继续用于分析国家的繁荣问题”。“该书被译成12种语言,它涉及全面的经济史知识,目的在于

<sup>①</sup> 张宇燕:《强化市场型政府乃经济发展之根本》,《读书》2005年第3期。

追问集体行动的逻辑怎样才能解释各种政治管辖下的一个更大的带有共容利益的利益集团会支持与更普遍利益而不是狭隘利益相关的政策”<sup>①</sup>，而《权力与繁荣》“最明显的看法就是将政治学中的权力与经济学中的繁荣两个议题结合起来”<sup>②</sup>。但是，卡德威尔指出，奥尔森思想的中心议题是社会的经济繁荣，认为“奥尔森以经济学学科的训练与理论创新，用一生的时间追问公共与私人繁荣的根源”<sup>③</sup>，集体行动理论只是奥尔森的一个简洁而又具有广泛解释力的工具和基础理论。正是因为奥尔森一以贯之地以“集体行动”作为工具和独特视角来分析重大经济问题，罗伯特·索洛称他为“别具一格的经济学家”。

结合上述看法，从《集体行动的逻辑》与《国家兴衰探源》这两部重要著作来看，很明显，前者是后者的分析工具与基础，后者是前者的运用，概言之，奥尔森用“集体行动分析法”分析国家的兴衰。但是其中隐含了对集体行动的价值判断的转向：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奥尔森关注的主要问题是有益的集体行动为何没发生，或者说关注的主要问题是集体行动的困难，隐含了对其正面的价值评价，但是在《国家兴衰探源》中却用分利集团的瓦解说明二战后一些国家的繁荣与增长，用特殊利益集体活动的成功说明一些国家的衰落，其中隐含的对于集体行动的评价是负面的。本书认为对集体行动有利还是有害的隐含价值判断并不影响其理论的体系化特征，相反，这表明奥尔森追求简洁、解释力强和一以贯之的分析模型，即他所推崇的“达尔文的方法”<sup>④</sup>。

从《集体行动的逻辑》与《权力与繁荣》的关系来看，《权力与繁荣》似乎是将一个全新的话题纳入讨论范围：什么样的“权力”行为才是有助于社会经济繁荣的？但是，《集体行动的逻辑》同样是《权力与繁荣》的逻辑起点与理论基础。在《权力与繁荣》中，奥尔森同样反复强调了对于大的潜在集团来说，强制往往是其成功组织起来的必要条件。政

① Charls Cadwell 为《权力与繁荣》中译本写的序，见曼瑟·奥尔森：《权力与繁荣》，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8 页。

②③ Charls Cadwell 为《权力与繁荣》写的序，见曼瑟·奥尔森：《权力与繁荣》，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7 页。

④ 张宇燕：《强化市场型政府乃经济发展之根本》，《读书》2005 年第 3 期。

府作为强制力的集中者,显然与大集团的集体行动有关。更为重要的是,社会作为一个最大的潜在集团,显然不可能通过自发的集体行动或社会契约而提供人们需要的公共品。这是《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的核心观点。在《权力与繁荣》中,奥尔森的理论归宿点在于,强调“繁荣的市场经济”需要两个条件,即“可靠的界定清晰的个人财产权利”和“不存在任何形式的掠夺”<sup>①</sup>,进而强调政府权力对于经济繁荣的重要性。在《国家兴衰探源》一书中,奥尔森认为对于一个稳定的民主社会来说,自由贸易政策显然不能保证经济增长,源于“经济人”集体行动的“分利集团”的掠夺性再分配阻碍了经济增长。现代民主社会中最严重的掠夺是“分利集团”的掠夺。抑制分利集团的掠夺,培育广泛性组织,显然是政府的重要职责。

归结起来,这三部著作的思想可以系统表述为:在民主社会,出于个体的经济理性,人们存在“集体行动能力的差异与不平等”,小集团容易组织成功的集体行动,而人数众多的大的潜在集团存在集体行动的困难,这就注定了,一方面社会的公共品并不能完全依靠理性经济人的自发行为而供给出来,另一方面在长期稳定的条件下会产生许多特殊利益集团,这些取得集体行动成功的少数特殊利益集团,在狭隘的经济理性指引下,具有很强的“分利”倾向或者说非生产性特征,最终构成经济增长的阻力,因此,社会的经济繁荣依赖于与社会整体利益具有“兼容利益”的权力组织提供公共品、抑制掠夺行为,政府对社会的经济增长与繁荣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权力与繁荣息息相关。

从奥尔森的学术思想路径来看,他的理论研究起点是集体行动问题,但他关注最持久的问题却是社会如何实现经济长期繁荣。20世纪60年代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实质上关注的是公共物品或公共领域的繁荣,强调政府对公共品的供给责任;80年代他提出的“分利集团理论”旨在强调要认识到和消除现代民主社会的经济增长的障碍。而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奥尔森的兴趣明确集中在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上。在1996年的《丢失在马路边的大额钞票:为什么有些国家

<sup>①</sup> 曼瑟·奥尔森:《权力与繁荣》,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1—152页。



是富裕的而有些国家是贫穷的》一文中,他认为合适的制度与经济政策影响了贫穷国家中人们捡起大额“钞票”的动力。“一个国家(政府)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要 wise up”<sup>①</sup>。他认为,贫困社会的最大挑战不是资源的缺乏,而是它们很难组织大规模活动,特别是政府活动。“不管在发达国家存在什么样的最优政府角色,在发展中国家,政府角色相比而言是更小的”<sup>②</sup>。到了90年代,“在其他人在还在辩论(政府)是否是问题的一部分或者是解决问题的一部分的时候,奥尔森的研究努力却已转向更为有用的问题上,诸如什么类型的政府、什么类型的政府安排会导致经济增长这样的问题”<sup>③</sup>。奥尔森从80年代开始逐步深入地走向他的理论终点:即探讨什么样的政府行为才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与繁荣。

总之,集体行动理论是其基础理论工具,而社会的经济增长与繁荣是其关注的中心,政府的责任是其理论归宿,其中包括三个核心范畴:理性、权力、经济增长或经济繁荣,奥尔森的三部著作呈现了个体经济理性、政府权力与经济繁荣的“三角形”关系讨论框架。

### 三、奥尔森学术思想研究现状与其在中国的传播

自从1965年奥尔森发表他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之后,这一理论被学术界大量引用,一批经济学家还以“集体行动”为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例如前面提及的罗素·哈丁的《集体行动》(1982)和托德·桑德尔的《集体行动:理论与含义》(1992)等。

当然也有人从研究中质疑和批判了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的主要结论。例如,马威尔和奥立佛从“公共品类型”视角指出,奥尔森忽略了在现实生活中零和型公共物品与非零和型公共物品的区别。从非零和型

---

① Charls Cadwell为《权力与繁荣》写的序,见曼瑟·奥尔森:《权力与繁荣》,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前言第9页。

② Mancur Olson, Diseconomies of Scale and Development, Essays in Honor of Peter Bauer, *Cato Journal*, Spring/Summer 1987, Vol. 7(1). p. 96.

③ Charls Cadwell为《权力与繁荣》写的序,见曼瑟·奥尔森:《权力与繁荣》,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前言第5页。